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七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四〇期 ——  
（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05c）

---

【史实辨析】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	丁凯文
【研究动态】高文谦新书质疑林彪事件真相	方 冰
【史料综述】“文革记忆”——“当代思想史”片断	樊 星
【痛定思痛】《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	冯骥才
【前事不忘】关于“文革”博物馆	冯骥才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史实辨析】

林彪事件几点问题的再辨析

• 丁凯文 •

关于林彪事件，世上已有多种著作和大量相关文章问世。刚刚出版发行的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无疑给这一事件的深入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林彪事件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再深入的探讨，以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庐山会议的斗争仅仅是一场权力之争吗？

对 1970 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的发言讲话，中共官方一直解释为林想当国家主席，急于篡党夺权，未经毛泽东的批准同意，擅自在会议开始时率先发难，打出“天才论”为幌子，为自己抢班夺权作舆论准备。近年来大陆和海外的一些学者则倾向于林彪集团与毛泽东支持的文革派产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就是双方为四届人大权力的再分配而引发的一场权力之争。

中共官方的这一解释在近几年来已被不少学者质疑乃至推翻。王年一、何蜀先生的《“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一文就彻底驳斥了这一谎言。（1）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也以无可

辩驳的事实说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事先是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才作的，而且林的讲话并未涉及设立国家主席。但毛事后为了打倒林彪故意撒了弥天大谎，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林彪的头上。（2）这些研究对推动林彪事件的深入探讨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关于庐山会议这场斗争的实质人们仍不免将其解释为林彪与张春桥等文革派的权力斗争。

这种说法从一个方面来解释庐山会议的斗争也许不错，但并不能全面解释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大陆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先生就林彪事件的实质曾说过一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是反毛不反党”（3），这句话十分中肯，一语道出了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中共九大前后围绕的是继续无休止地大搞群众运动、政治斗争，还是恢复经济建设，抓好国计民生，毛泽东与林彪就这一问题产生了根本的分歧。中共九大之前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共同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陈伯达甩开张姚二人单独起草，在林彪的支持下，陈草拟的报告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经过一个月的辛劳陈终于完成了这篇大作。但很快就被毛泽东彻底否定，毛甚至根本就没完整读过陈的稿子，只从其草拟的提纲和部份草稿就否定了陈的思考与劳动。在中央讨论张姚起草的九大报告时，陈与张姚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陈伯达很激动地抨击了张、姚的报告稿子，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是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陈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4）显然，没有林彪的大力支持，陈伯达是不会与本是为文革派自己阵营内的人如此激烈争斗的。林彪对张姚起草的稿子更是不屑一顾，九大开会前根本没有看过张姚的九大报告，临上台时才拿到手去读，读时不免磕磕巴巴，以致叶群事后埋怨林彪。可林自己却说“多读错些才好”。这显然不是林彪待毛的一贯紧跟的风格。只能解释为毛林在根本问题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毛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群众运动为基础，以所谓的大乱达到大治。而林彪则希望国家应及早结束无休止的运动，恢复正常的生产，这样才能使国家真正繁荣富强。而1970年8月九届中全会的庐山会议，不过是另辟了一个战场，毛林斗争换了另一种方式进行。

不少学者指出，庐山会议上林彪之所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是因为毛泽东忧虑林彪集团尾大不掉形成对毛的另一种威胁，故打算以张来取代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从而导致林彪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在庐山会议上率先批张。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严格说来，林彪的合法接班人地位在九大上就已记入党章，再加上林系在中央的势力大增，而张春桥乃一文革暴发户，因有毛的背后撑腰在上海一夕夺权成功，其初入中央根基尚浅，还缺乏与林彪一系斗争的资本。纵观林彪在文革中的一贯做法，一直是毛泽东赞成我赞成，其个性从来讲究不先出头，根本无需针对所谓的张春桥的威胁刻意与毛支持的文革派过不去。但为何这次林彪一反常态呢？笔者认为，庐山会议上林彪与文革派的冲突实乃九大政治报告斗争的延续，而这一冲突却以另一种面目出现。

林彪其人在文革中虽然不得不跟随毛泽东大唱文革赞歌，但骨子里却不赞同毛的治国方针，对张春桥等靠舞文弄墨一夕升天的文革派更是看不上眼。而张春桥却深得毛氏真传，在张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张氏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理论，大力鼓吹阶级斗争，强调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个理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理论论证，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而林彪则认为在九大之后国家应该步入正轨，重视国计民生，此点与周恩来的看法不谋而合，故此周林关系更为融洽。林彪希望自己以接班人、副统帅之力打击一下张春桥等文革派的气焰，但又不公开反对毛所支持的九大路线，可实际上已表明林彪与毛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从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的回忆可以看出林彪主动出面敲打张春桥，由林立果向军队系统打招呼，让大家密切注意予以配合。（5）但庐山会议的结果却出乎大家的意料。林彪敲打张春桥得到了与会人士的大力支持，不仅林系的人马大力批张，连陈毅这种“老右派”及毛身边的红人汪东兴也站到反张行列，可以说林彪带头批张的举动大得人心。张等文革派因在文革运动中的种种倒行逆施早已被人们深恶痛绝，张春桥更成了过街老鼠，大家批张的目的显

然并不仅仅是冲着张一人，而是对毛发动的这场整人运动发泄不满，利用这一机会全面反击文革派。应该说林彪很清楚地看到这一趋势，只是他没想到毛泽东根本无法容忍任何人对文革的反攻清算，即使贵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也不在话下。

对比1959年和1970年的两次庐山会议，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前一次由彭德怀带头批评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三面红旗给中国带来的大灾难，而后一次则由林彪出面批判张春桥等文革派的所谓“反天才论”，而批判的矛头实则指向后台老板毛泽东，尽管其表面上是以所谓“天才论”为契机。两次庐山会议都触及了毛统治地位的合法性，尤其是第二次庐山会议，以林为首的军人系统和被文革派全面打压的党政系统，联手利用张春桥的所谓反天才论小题大作，掀起了批张浪潮，大有不把张拉下马绝不甘休的架势。毛泽东很快就意识到反张实际上就是反毛，就是对文革的清算，如不立即制止势必牵扯到文革其他方面，从而导致文革派的全军覆没。于是毛立即出面力挽狂澜，坚决打压这股反文革势力，特别是当毛意识到林彪在文革一事上并不跟他一条心，毛开始处心积虑地要拿掉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毛先从批陈整风入手，斗争矛头终于一步步指向了林彪。因此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并不仅仅是所谓林彪与文革派的权力斗争，更深层的原因是毛林在政治观点上对立而最终导致了这场无法避免的冲突。

## （二）关于李文普作伪证的问题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也谈林彪9·13事件》中就此问题论证了李文普作伪证的可能。（6）最先公开指出这一问题的是张宁女士。张宁女士在其回忆录《尘劫》一书中指出，李是与纪登奎领导的专案组达成三项交换条件后才供出林彪是自己主动出逃的，且目标就是苏联。（7）这一交代为日后中共官方定性林彪事件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李文普的交代有明显的漏洞。陈晓宁先生在其《质疑林彪“9·13”事件》一文中充份揭示了其不合情理和逻辑之处。（8）但我们的这些质疑都还是从常理和逻辑上来论证李很可能是在压力之下迫不得已作了伪证，而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李就是作了伪证。李文普自己就出面写文章反驳张宁女士的“伪证论”，为自己在9·13事件前后的行为辩护，但他心虚的是根本不敢正面面对他与专案组达成交换条件一事，在自辩文中完全回避了这一关键的问题。（9）而最新出版的高文谦先生大作《晚年周恩来》则披露了关键的证据。

高书是这样写的：“据知情人透露，九月十二日午夜，林彪在乘车驶往山海关机场的途中，曾经命令随车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中途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拦阻，林立果为此开枪打伤了企图执行命令的这位警卫秘书。”“据说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但遭到专案组的训斥，随即被单独关押起来交代问题。迫于政治压力，李后来只好改口，回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车这一情况，而把它说成是在听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他本人要求停车，以换取保留他的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的宽大处理”（10）高先生是在林彪事件多年后采访当时的林彪专案组负责人纪登奎时，纪向高透露的这一情况，其史料价值极高，使人们真正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纪登奎本人曾是林彪专案组的负责人，专门负责审查林案的所有当事人，其秉承毛泽东的意图为林彪事件定性不惜罗织罪名，在审查林案期间因一时苦于找不出合理的证据，所以在李的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终于换来了这句林彪是自己主动叛逃苏联的伪证。

其实李文普作伪证一事在原林办人员内部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而且是大家的共识，大家对此心知肚明，只是迫于形势无法开口讲话而已。李文普反驳张宁女士的文章出来后，张宁曾打电话给一位当年林彪的贴身内勤，提到李的这篇文章，这位内勤当即说“李文普作伪证那不是明摆着的事嘛。可他当时不那么做也不行，上头不会放过他。”（11）还有一位林办的老秘书亦致书张宁，一语点出了李的伪证行为：“焦点的问题是九一三事件仍然被李文普的那句话维系着结论，活着的人，他又是关键，这只有从外围突破，他的防线则不攻自破。”（12）高文

谦先生的书所披露的事实真相恰恰就是“外围突破”，它使李文普的伪证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遁形。

虽然我们已确知李的伪证行为和中共官方为打倒异己而故意罗织罪名致人于死地，但我们还应更深入地挖掘林彪9 1 3事件的真相，到底林彪一行在去北戴河机场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林彪是如何在中途下令停车，而李胳膊上的伤口如何而来等等，其中尚有一些疑问都是我们应予以认真考证分析的。比如说，李自称林立果开枪击伤其左臂，而不少林办的人认为是李自己自伤。其实鉴定李是否自伤并不困难，只要检查其所佩枪支，对比弹道和伤口形状特点，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事发后林办人员对此就有明确的看法，并非如李自己后来所说是林立衡对他栽赃陷害。

### （三）林彪有无密谋杀害毛泽东

中共官方在9 1 3事件后公布了一系列“林彪罪证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林彪指使其子林立果在毛南巡途中下手杀害毛泽东，比如指控林立果策划在毛南巡途中放置炸药炸毁列车、用歼击机轰炸毛的专列火车，以及《5 7 1工程纪要》等。国内的官方学者均持此一观点，海外的学者也不乏此论。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就认为，在毛泽东的步步紧逼下，林彪不甘坐以待毙，“遵循‘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古训，依靠自己的儿子林立果了，有意放‘虎’出山，作为他手中与毛泽东最后摊牌时的杀手锏”（13）。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作为一位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过无数胜仗的开国元勋，林彪深知他与毛泽东的这场斗争毫无胜算。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毛泽东的个人地位和威望在文革中已达巅峰，而其中很大原因就是林彪当年在军队中大歌大颂毛泽东思想，一切以政治思想挂帅，推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等，并将这种个人崇拜全面推向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这种以林彪为首制造的全面、彻底的个人崇拜已将林彪与毛泽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举凡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同时，还必须高颂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此时此刻人们如何会想象在一夕之间会听到敬爱的林副主席反毛的言论，又有多少人会跟随林副统帅揭竿而起，吊民伐罪。

第二，表面上林彪贵为副统帅，党章上明确记载的接班人，可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实权。文革中任何大小事项的决策权都在毛泽东，而执行权却在周恩来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而文革小组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远大于周恩来。林彪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也只局限于原四野的老班底，黄吴李邱虽分居军内要职，但事事还必以毛泽东马首是瞻。且其他方面军的老帅老将们也不买林彪的帐。所以尽管中共九大上林彪的势力大增，但与此同时江青等文革派也大有斩获，分居中央其他要职，为毛分兵把口，成为另一股中坚势力。当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林彪时，在利害关系的选择上，以及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原来效忠林彪的人除了表态效忠毛泽东外别无选择，其他人如周恩来等更不会为林彪火中取栗，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到头来只会落井下石，会以对待彭罗陆杨，对待刘少奇一样对待林彪自己。

第三，林彪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几十年，深知毛的为人。建国以来多次党内斗争，回回都是毛以全面胜利而告终，毛集历代宫廷权力斗争之大成，算无遗策，其对手们无不以惨败而收场。以林彪的身手又如何是毛的对手。挺身而出只能招致更大的杀身之祸。所以林彪在庐山会议之后乾脆放手不理政事，这种无所作为也许还真让毛泽东一时抓不住林彪什么把柄。但毛毕竟非等闲之辈，加你头上一条罪状不就得了。毛最后不得不祭起欲加之罪的法宝，将党内正常的讨论设立国家主席一事说成是林彪急于篡党夺权，而其背后的原因毛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的。

那么如何解释官方出示的那些林彪妄图杀毛的罪证呢？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不少关于林彪 9 1 3 事件的书，大都以原中共中央文件和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为主，绘声绘色地将所谓林彪杀毛的情节具体化、生动化，以博取广大老百姓的好奇心，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尽力开脱，似乎是毛泽东洞察了林彪的一切，及时粉碎了林彪的政变阴谋等等。然而所有这种指控都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经不起认真的分析和推敲，因为它们的漏洞实在太多了。

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彪指使过手下大将黄吴李邱依靠军队反毛搞政变。众所周知，政变杀毛一事非同小可，不是像过家家玩一样，一次不成还可再来一次。这一行动必然要有精心策划，谁负责调动军队、谁负责控制舆论，谁负责一切善后工作等等。迄今为止，中共说不出任何这种证据。对比华国锋、叶剑英在毛死后抓“四人帮”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华、叶是如何精心策划、如何调动军队执行的这场宫廷政变。而林彪一案，我们却看不到任何指控林彪阴谋政变这类具体证据。林彪的贴身秘书、警卫、内勤都否认林彪有任何政变杀毛的图谋，甚至就连李文普也说不出林彪有任何阴谋政变的证据，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

其次，中共指出的那些杀毛言论皆出自林彪之子林立果。认真分析一下这些指控，林立果却只有言论，而无实际行动。无庸讳言，林立果是当时那个社会的异数，虽然他很年轻，但由于他独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他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有深刻的批判，其言论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中共社会和毛泽东统治的实质。看看《5 7 1 工程纪要》的思想，即使是现在也令人振聋发聩，不啻为一篇杰出的讨毛檄文，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思想不能不说其具有林彪的思想的烙印。庐山会议后，林立果看到毛的步步紧逼，林彪迟早会步上刘少奇的后尘，毛的南巡更是图穷匕现，招招要致林彪于死地。此时的林立果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甘心自己的父亲就此沦为阶下囚，于是在与自己的亲信们商量对策时言语过激，除了痛揭毛泽东出尔反尔、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外，毫无可行的实际计划，与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的谈话更显出他思维的幼稚和有勇无谋，这些言论不仅不能救林彪于万一，只会更快地给林彪带来杀身之祸。不少人认为，林立果的言行必然是林彪指使的结果。可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林彪根本不可能糊涂到用自己的儿子去杀毛，林立果虽然身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但根本无权调动一兵一卒，更何况指挥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宫廷政变。中共事后找出的证据大都是欲加之罪，不少当事人迫于压力作了伪证，事后又再翻供。看看后来记者许寅对所谓林彪在浙江的死党陈励耘的采访，就不难得出所谓林彪指使林立果杀毛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1 4）那些天方夜谭式的林彪杀毛演义不过是小说家言，根本不足为信。难道事隔多年之后人们还应相信这些谎言吗？

再次，也许有人会说，正是因为林彪发现自己阴谋败露才会匆忙逃亡。笔者认为，林彪在 9 1 3 之前深刻认识到毛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所以他对自己身边人讲“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林对自己的家人甚至说，“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这哪里是要与毛泽东拼个鱼死网破、做困兽犹斗呢？这明明是林彪看透了毛泽东的企图，对毛已不抱什么幻想，大有慷慨就义的气概。笔者分析，在最后关头林立果将他的言论和盘向林彪托出，林彪此时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就林立果的那些言论就足够将林彪定了反革命的死罪，更何况那些善于搞专案的打手们的“逼供信”呢？笔者分析认为，正是由于林立果的不智行为铸成大错。虽然林彪被叶群和林立果逼迫尽快逃离虎口，林彪甚至一度也应承下来，但林彪最终表态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不愿行被迫出走的下策。然而在最后关头，林彪于昏睡状态下被叶群和林立果强行架离北戴河，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

走笔至此，笔者常想如果林彪不走、不离开北戴河，会是什么结局呢？毛泽东一定会向用对待刘少奇、贺龙等人的方法对待林彪。凡被毛打倒的人，毛几乎不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更何况林彪身为四野的旗帜，手下精兵强将，有朝一日也许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解决这一心腹大患，置林彪于死地而后快。而且林彪注定要替毛泽东背历史的黑锅，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事和种种罪行一股脑地推到林彪的头上，真是再合适没有了。历史的

发展果然就是如此。时至今日中共当局依然如此曲解历史，强奸民意，什么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好心办了坏事，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等等。如果中国不能从批毛着手，林彪事件就无法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 （四）周哭林彪为哪端？

近年来一些文革著作常引一段不大不小的情节，即周恩来在林彪死后曾嚎啕大哭。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对此有翔实的描述。高先生是在采访纪登奎时纪向高作了这一表述。现原文引述如下：

“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抓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15〕

是什么原因导致周恩来在林彪死后如此伤心，乃至当着纪登奎和李先念的面不能自己呢？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有如下解释，即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却叛国投敌自我爆炸，周恩来深感无法向世人交代其中之原因。〔16〕这一解释极为牵强。中共自建国以来大搞阶级斗争，整人无数，从打倒高岗到打倒彭德怀、乃至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中共何时感到无法向老百姓解释其中的原因了，毛泽东何愁找不出理由，给对手安个什么“反党、反革命”、“里通外国”、“叛徒、内奸、工贼”什么的罪名，可说是随手拈来，至于证据嘛，可以用非常手段获得。这些人反党反毛，罪该万死，老百姓只有听的份，跟着走，反正毛泽东是一手遮天了。

对周哭林彪一事，华飞先生的《“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一文〔17〕以及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书里都有极其深刻独到的分析，特别是高先生的书指出毛周因治国理念的不同，周长期在毛的阴影下生活，有志难伸。〔18〕这一解释有相当的道理。但笔者认为周恩来之哭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毛泽东搞文革的一个首要因素就是要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说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而刘之后紧接著又是林彪，这两个接班人原都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对毛都是紧跟又紧跟的人，可他们最终尚且逃不出死于非命的结局。而周恩来从来就没被毛泽东考虑为自己的接班人，更何况周在历史上多次反过毛，毛手里还攥着“伍豪启事”这等“脱党叛变”的把柄，随时可以抛出来作为打倒周恩来的法宝。以前毛的对手是刘林，周还可以在躲在后面暂避毛的斗争锋芒，现在由于历史的原因周恩来一下子被推到了“二把手”的位置上，周本人能不心怀戒惧？林彪之死，周能不兔死狐悲？毛泽东的下一个斗争矛头必是他周恩来无疑。所以当纪登奎一提及林彪自我爆炸应该高兴时，周不仅不能高兴，反而悲从心来。周只能告诉他们“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显然，周恩来心里明白他不仅又要作一个新的专案组的负责人，制造新一轮的迫害，很可能他自己也逃不过这一被整的厄运，毛泽东怎么会容忍他周恩来坐稳接班人的位子呢？事实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周很快就成为毛批斗的另一目标，批林批孔转而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毛甚至在周诊断出膀胱癌时阻挠周的及时医治，杀周于无形。〔19〕毛周的关系到最后活脱脱就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现代翻版，慈禧怎么能容忍光绪死在自己

之后呢？想通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周恩来在林彪死后之所以嚎啕大哭的原因了。

#### （五）林彪事件为何得不到公正的评价？

自中共粉碎了“四人帮”后，中国终于告别了毛泽东的暴戾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收拢人心，开辟新的局面，中共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要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文革中第一大冤案非刘少奇案莫属。而文革中定的与刘相同的大案则非林彪一案莫属。为何刘案可以顺利平反昭雪，而林案却得不到应有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呢？笔者认为这里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刘少奇一案因涉及当年的刘邓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是当事人之一，邓上台掌权后当然要为之全面平反翻案。可涉及到林彪一案时，邓却换了另一种说法。据知情人讲，邓曾说过，一零一（指林彪——作者）的问题涉及到是要共产党还是要林彪。显然这句话根本没有是非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中共给林彪以公正的评价，势必涉及到毛泽东的问题，为了这一大前提，林彪也只好在死后仍要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背历史的黑锅。其实中共已经承认毛泽东在文革一事上的责任，但为了中共一党的合法统治，中共大员们还必须维护好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毛泽东的罪行被掩盖、缩小，一切罪恶都被解释为林彪与“四人帮”的作用。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文革研究要“益粗不益细”，细的结果必然就会追究到毛泽东的头上，损及中共的合法地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高举毛的旗帜，维护中共的合法统治，与此同时宣传上也必须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任何涉及到林彪事件的研究都必须与中央审查报告和中共特别法庭审判为准。这也是为什么林彪事件的研究难于深入进行的一个原因。

二是，邓小平对林彪个人的冤怨。邓表面上说公正评价林彪事件会损及中共及毛泽东的形象，其实细想想也不尽然。那么多在毛泽东时代定的大案要案不也被平反昭雪了，大到刘少奇案，小到胡风、梁漱溟案等等，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难道就不损及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吗？就算多了一个林彪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实际上正是因为林彪在文革中助了毛一臂之力，打倒了刘邓集团，刘因此死于非命，邓虽幸运地活了下来，却也经历了几年艰苦的流放生活，大儿子邓朴方更因自己的缘故终身残废。可以说邓对毛林有着刻骨仇恨。邓在 9 1 3 事件后恨恨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其书《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毫不讳言邓本人对林彪一向无好感。大陆一些研究林彪事件的人如图们、肖思科，在其修定版的《超级审判》一书中间提到审判“四人帮”时就披露，邓小平说“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也该重新审理了，在揭批四人帮中必须联系林彪，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林彪不可，林彪对军队毒害很大。过去没有怎么批，被四人帮包庇下来……揭批四人帮联系林彪，这是顺利成章的事，不存在历史旧帐的问题”。〔20〕由此可见邓小平对林彪事件的态度。所以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林彪事件长期无法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走笔至此，笔者深有感触，即一件历史事件的真相大白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特别是当它被当权者刻意精心掩盖和歪曲之后，要让世人真正认识其真相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它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甚至几代人的持续努力。近来出版的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就是一部揭示文革真相、毛周关系以及毛林关系真相的代表作。笔者愿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达成抛砖引玉，继续推动林彪事件的研究，并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专家学者和林彪事件的当事人站出来，为这一历史真相的大白而努力。

注释：

〔1〕王年一、何蜀《“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 2003年 第290—292页

- (3) 王年一在文革三十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 (4) 王文耀《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前后》原载《中共党史研究》
- (5) 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 (6) 丁凯文《也谈林彪9.13事件》原载《枫华园》第355期
- (7) 张宁《尘劫》明报出版社 1997年6月 第319—320页
- (8) 陈晓宁《质疑林彪“9.13”事件》，原载《枫华园》第32期特刊
- (9) 李文普《林彪事件真相》原载《信使文摘》2000年10月19日
- (10)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 2003年 第347页
- (11) 笔者对张宁女士的采访
- (12) 《致张宁女士——一封关于林彪事件的信》，原载《枫华园》第32期特刊
- (13)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 2003年 第320页
- (14) 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 (1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 2003年 第358页
- (16) 周秉德《林彪乘飞机外逃折戟沉沙 周恩来因何嚎啕大哭》
- (17) 华飞《“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
- (18)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 2003年 第359—360页
- (19)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 2003年 第378—379页
- (20) 图门、肖思科《超级审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27页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志还先生及陈晓宁先生的大力帮助，本人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

#### 【研究动态】

#### 高文谦新书质疑林彪事件真相

· 方 冰 ·

《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根据对多位当事人的采访，就林彪事件提出多种与中共专案组结论相反的推断。他认为，林彪同毛泽东的分歧是政治主张的不同，而林彪要求发展经济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高文谦认为，林彪被逼走上叛逃之路是毛泽东企图除掉林施展种种权谋的结果。他还以对一位已故副总理的采访，质疑中共加在林彪头上的“叛逃苏联”的罪名可能是对证人施加政治压力逼供的结果。

林彪事件是十年文革浩劫中的转折点。手摇小红书、口喊毛泽东万岁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突然间变成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不仅企图暗杀“伟大领袖”，而且还叛国出逃，并且在蒙古沙漠飞机迫降时爆炸身亡。虽然林彪的背叛使毛泽东陷于尴尬境地，但是一般中国老百姓对林彪也没有好印象。认为他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坏蛋。而中共在否定文革时，更把文革中几乎所有的错误归于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叙述林彪从毛泽东选他当接班人、利用他打倒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后来因为发现毛泽东言而无信、理念不同而与毛泽东交恶，直至最后发现毛泽东决心要把他除掉而仓惶出逃的整个过程中，披露了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内幕。

◇ 林彪主张文革见好就收



高文谦说，毛林之间的政治分歧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时就已经产生。那时候林彪刚被提为接班人，还没有写入党章合法化。表面上看左得出奇的林彪，其实却是主张文革见好就收，下一步要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文谦说：“林彪并非像中共官方说的那么坏。至少他想在九大之后更多抓一下经济建设，这对中国老百姓有好处，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与周恩来是一致的。所以在没有开九大之前就惹起了一场风波。”

这场风波就是陈伯达在林彪授意下把九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定为要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同毛泽东要继续革命、巩固文革成果的想法大相庭径。结果在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陈伯达被张春桥、江青等批为“唯生产力论”。毛泽东也对陈伯达大加训斥。

中共给林彪集团定的罪状之一，是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上迫不及待地要设国家主席，大肆宣扬“天才论”，企图抢班夺权。这一结论至今没有改变。1982年11月，高文谦对林彪集团主要成员吴法宪进行采访，发现毛泽东最先说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的。吴法宪在1970年3月8日直接听了汪东兴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高文谦说：“这个在国内，所有官方的这些文革史啊、文革研究史啊、周恩来传啊，都没有提这句话。这句话是个钩，是个诱饵，‘现在看来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不设为好。’这就是个套子。反正林彪这回是动了心了。”

#### ◇ 毛泽东撒弥天大谎

中共九大把林彪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党章，林彪实力大增。在70年8月召开的讨论四届人大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著名的庐山会议上，中共政治局五名常委中除了毛泽东，其余四名都赞成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对此大为恼怒。为了对付羽翼日丰的林彪集团，毛泽东采取抬高江青集团来制造林江两集团之间的矛盾。得到毛泽东暗示的江青集团开始批判林彪的天才论。林彪则在会上发言对张春桥进行回击。中共官方对于林彪的这篇讲话一直定性为“突然袭击”、“抢先发言”，其根据是毛泽东在一年后的南巡讲话中指“林彪同志的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高文谦采访吴法宪并考证了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和作家叶永烈的文章发现，林彪在讲话前曾同毛泽东谈过话，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还对林彪说：“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高文谦说：“这一点毛泽东对天下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在南巡讲话说‘林彪讲话没有经过我’。这是一个假话。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你不把这些问题解释出来，你就不了解林彪为什么有这么大气。”

高文谦认为，林彪最后的叛逃是毛泽东步步紧逼的结果。他说，在毛林关系紧张之后，林彪多次表示想要同毛泽东见面，但是毛泽东拒而不见。高文谦说：“为什么毛泽东不许见？毛泽东见他之后就解释不清楚了。因为毛泽东跟林彪说了很多假话，给林彪许空头之愿：‘两年之后我就退了，张春桥这个人怎么样，到时候由你去处理去吧。’林彪一开始还将信将疑，后来发现庐山会议之后发动批林整风矛头完全是冲着他来的，所以林彪心里当然不服。”

#### ◇ 林彪出逃疑云重重

1971年9月13日林彪搭机叛逃后摔死在蒙古沙漠这件事，不仅使毛泽东大为震撼，也使全国老百姓大感惊讶。为了向全党全国做出交代，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很快对林彪做出了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叛党叛国的结论。但是这些匆匆做出的结论三十年多年来受到了多方质疑，使林彪出逃案一直疑云重重，包括周恩来和毛泽东得知林彪出逃的动向是因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的主动报告。高文谦说，林立衡报告的目的是要中央阻拦其父亲出逃，因为林立衡相信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逼迫的。周恩来和当时担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的张耀祠答应了她的要求。高文谦在书中说：“北戴河的警卫部队也为此作了几种应变措施，然而他们后来却并没有像林立

衡保证的那样全力阻止他们出走，而是眼看着这一行人升空了，这一点当时就引起了林立衡的愤慨和怀疑。”

高文谦对林彪是否如专案组所定的叛逃到苏联提出质疑。高文谦说，中共据以对林彪叛逃苏联定性的是一个“孤证”，即这一事件的唯一幸存者、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的口供。根据高文谦1988年春对当时负责林彪专案组具体工作的副总理纪登奎的采访记录，李文普最先的口供是林彪在乘车前往机场途中，曾命令李停车，似有不想前往机场的意思，但是后来在专案组的训斥下李又改了口，把情节改成，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还有多远？”

伊尔库茨克是前苏联的一个城市。李文普本人在这之后要求停车。这一口供导致确定了林彪投奔苏联的罪名。

高文谦表示，近年来中国大陆内部，特别是林彪原第四野战军的部下，对中共在林彪叛逃问题上所下结论提出很多质疑。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和另一位作者吴润生合写的文章呼吁：“我们不甘心被历史的造假者、伪装者、扭曲者、隐瞒者永远蒙蔽！请还我芸芸众生对历史真相的知情权！时代已进入了新世纪，这人权中起码的要求应该不难实现！我们期待着。”

□ 转载自《美国之音》报导

~~~~~

#### 【史料综述】

### “文革记忆”——“当代思想史”片断

• 樊 星 •

普遍的善良导向普遍的邪恶

.....

革命洗劫革命。人民戕害人民

这是多少种怪病的综合症状？！

——高伐林：《关于设立文化大革命国耻日的建议》

1996年即将来临，“文化大革命”爆发30周年，结束20周年的纪念之年即将来临。

1986年，巴金老人曾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1〕十年过去了，虽然“文革”博物馆作为一座建筑物一直没有奠基，然而，大量的“文革”纪实和“文革”回忆录却层出不穷，它们已经在当代文化思想史上建立了一座文字的博物馆。“文革”作为当代中国史上一次巨大的政治动乱、经济危机、文化浩劫，作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各种思潮彼此冲撞、交汇的大试验场，作为当代造神运动、乌托邦梦想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作为世纪末精神危机、文化危机的巨大温床，作为世纪末思想解放运动的产房，作为无数冤魂，无数受伤的心灵无法忘却的一场噩梦——多少人想忘也忘不了！当代文坛上，记述“文革”悲剧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回忆录……成千成万，或宣泄着历史的忧愤，或探索着悲剧的源头，或展示了灵魂的伤痕，或记录下觉醒的足迹。它们不仅昭示了苦难的记忆，也为人们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的多个角度切入，研究这场活动的复杂原因与复杂进程、探讨个性、民族性乃至人性生存与毁灭、畸变与更新的深刻奥秘，反思社会主

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教训，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这当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当我们了解到：早在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就开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作为基本课，由《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的作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主讲，选修此课的学生多达700多人，哈佛大学图书馆甚至收集了“文革”期间的各种小报，〔2〕——这时，便令人感到了早日着手此项工程的迫切性。

本文便是通过研究当代大陆文坛上公开发表的“文革”纪实、“文革”回忆录，探讨“文革”发起者与参与者的某些心灵轨迹，进而思考当代思想史某些课题的一个初步尝试。

#### ◇ “文革”：权力斗争的变幻风云

“文革”的发动者是毛泽东。在谈及发动“文革”的动机时，毛泽东曾说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反修防修”是他发动“文革”的理论出发点。而当他认定党内存在着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时，“反修防修”的抱负便落实为“炮打司令部”的激烈夺权行为。“夺权”成为“文革”的一个基本政治主题。“文革”前期，“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语录歌广为传唱，“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夺权的艰难，保权的重要”的顺口溜（据说是副统帅的概括）尽人皆知。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以刘少奇等人被打倒而结束；两派群众的“全面内战”的结局却是两败俱伤。毛泽东以大战略家的英雄气概通过“文革”牢牢把握住了大权，可为什么在斗争中也常常给人以无力驾驭历史进程的印象？

王力在《“文革”第一年》的回忆录中告诉人们：“毛主席最初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后来完全不一样。最早说搞3个月，后来说半年，然后又是一年……主席是越碰钉子越要搞下去，”可到后来，“主席也收不住场了。”打倒刘少奇，原来还想给他留中央委员的位子；他还至少讲过十次“刘、邓要区别”，有心保邓小平过关；他还力图控制动乱的扩大，说过“打倒那么多，我也不高兴”的话，骂过陈伯达、江青，批评过文革小组内部没有民主集中制……但是，动乱一旦发动，其势之猛，其规模之大，已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3〕——正应了他常说的一句话：阶级斗争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没有想到他选定的接班人林彪会背叛他，也不曾料到“四人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泽东晚年的巨大孤独与巨大不安，耐人寻思。

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但他的巨大苦闷也尽人皆知。刘亚洲的《恩来》中记录下周恩来“文革”中苦涩的笑容、古怪的神情、难言的悲叹，并将这一切与周恩来青年时代的雄姿英发、豪迈无畏对照着写，发人深思：“周恩来某些不易理解的表态，是完全为了顾全大局维系团结，还是多少别有隐衷？”〔4〕师东兵的《九大风云录》披露了“文革”中“四人帮”和“5·16”掀起“反周”狂潮的一段史实，勾勒出周恩来从忍辱负重到怒不可遏的情绪起伏轮廓，周恩来病重中的呐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读来惊心动魄。权延赤的《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也披露了无情的史实：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上……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一点’”，因此，“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而他最大的悲剧正在于：尽管他能忍人所不能忍，吃尽了屈辱、劳累的苦头，鞠躬尽瘁，居功至伟，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忠诚、坦荡、勤奋、谨慎……诸般美德兼备一身，却依然难敌野心、流言、猜疑、阴谋。周恩来的悲剧耐人寻味。“四五”天安门运动由追悼周恩来蔓延成反抗“四人帮”暴政的熊熊烈火，又足见天理之公正。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浪漫主义的战略家与一个现实主义的实干家之间，有合作亦有分歧，本属平常。值得研究的政治心理学课题是：毛泽

东怎样使周恩来服从于自己的意志？而周恩来又如何贯彻毛泽东的决策时巧妙地融入自己的计谋？周恩来是著名的忠臣，也是伟大的策略家。

权延赤的《龙困》梳理了贺龙悲剧的前因后果，也揭示了“文革”的一条重要源头：林彪与贺龙的尖锐矛盾。林彪抓“突出政治”，贺龙抓“大比武”——“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军事和政治可说是由来已久的一对矛盾”，更兼贺龙“对林彪的看法始终不好，这种反感很难讲清来龙去脉，大概是人格禀性的格格不入？”军事和政治的历史矛盾与禀性的格格不入交织在一起，使林彪、贺龙水火不容。而一旦林彪升为副统帅，贺龙的悲剧便在劫难逃。《龙困》多角度剖析历史纠葛，多层面解释悲剧的来龙去脉，与作家其他多篇“红墙文学”相比，此篇视角新颖、思考独特、最见功力。

那么多高级干部老实地任人宰割，不得宽恕；至情至性的许世友“悍然”率领部下“武装割据”，捍卫尊严，反而毫发未伤（见权延赤《女儿眼中的许世友将军》）——这也是历史：多次“整风”，为什么就没能驯服许世友的烈性？以暴力反抗暴力，反而震慑住了色厉内荏的狂徒。

荒坪的《炼狱春秋》重现了陆定一的苦难历程：从1960年批评林彪的“顶峰论”，1966年反对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宗教化，到“文革”中三次绝食都以“服从中央”的检讨告终，很能显示出一位高级干部的彷徨心态。在这种很有典型意味的彷徨心态中，足以使人感受到个性的抗争与犹疑、组织原则的坚固与微妙。

再来看看悲剧的另一面：“无产阶级司令部”中，那些“大秀才”们的命运也引人注目。

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都是“大秀才”，在“文革”中凭着笔杆子的威力崛起于乱云飞渡的政坛。如此多的“秀才”进入最高决策中心，也算得上是当代政治的一大奇观。他们为“文革”煽风点火，呼风唤雨，大显了身手，可一旦被卷入政治的漩涡，又莫名其妙地折戟沉沙，声败名裂。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倒台是因为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罪在乱军，但“带枪的刘邓路线”原是林彪的提法，到了追究责任的关头，林彪出卖了王、关、戚；陈伯达的翻船主要是因为庐山会议上鼓吹“天才论”，为林彪“设国家主席”造舆论……本来，他们乱党乱军，罪在不赦，但他们也有他们的历史教训。这方面，权延赤的《四个秀才一台戏》有传神的点化，陈伯达在“文革”前就有过“纸上谈兵”的感叹，（是自知之明？还是怀才不遇的嗟叹？）对朋友也不乏坦诚之情，（告诫天津市长胡昭衡：“第一，不可太积极，太积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第二、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到了“文革”中，他一面洞察风向，一面崭露头角，却也在告诫故友：“你记住我说的：胜利者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是教训？还是预感？）可为什么他尽力辨别风向，紧跟部署仍然马失前蹄？陈伯达的悲剧是野心的悲剧，是时势的悲剧，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证明。而他自己，还得出“狡兔死，走狗烹”的结论（见权延赤：《他与中南海的“大秀才们”》，此篇与《四个秀才一台戏》有颇多重复之处）——对这些“大秀才”的野心与伎俩、狂热与怯懦，大起与大落的研究，既是“文革史”的一个重要部份，又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

——匆匆一瞥，令人惊讶：“文革”，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黑洞。在一场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权力斗争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胜者。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林彪，自己也控制不了动乱的大局；周恩来苦苦支撑，竭尽全力也没能力挽狂澜；“大秀才”们发号施令，兴风作浪，终不免四面楚歌的结局……巨大的能量，巨大的热情，冲撞在一起，结果为什么是“熵”？难道“文革”注定是一场能量内耗的大悲剧？无论如何，“文革”的“熵”结局昭示了“一言堂”政治的失败（从而为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建设铺成了一条血路），昭示了政治规律对个性与神性、野心与阴谋的无情惩罚，也昭示了政治风云变幻的不可测度性与神秘性。

因此，“文革”是当代政治的一个转折点。

◇ “文革”：思想解放先驱的祭坛

“文革”是一场狂热的造神运动。“舆论一律”是其显著的精神标识。1949年以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为“舆论一律”铺平了道路，从表面上看，万众一心，众口一辞，思想单纯、情感朴素，然而，自由的思想却依然在一部份人的心头萌生。当众多的理论家殚精竭虑为一次次运动提供着理论依据时，另一些普通人却通过独立思考大胆闯入了思想的“禁区”，收获了思想的果实，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这些无意建构思想体系，有心研究中国问题；不愿意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敢于在无声处发出正义的呐喊声的人们，历史已记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不是理论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思想家。他们在当代思想史上留下的足迹又具有某种精神探险的意义。在未来的“文革史”上他们多半会以“平民思想者”的称号占一个不朽的位置。

王晨、张天来的报告文学《划破夜幕的陨星》就为遇罗克烈士树起了一块碑。这位中学生在“文革”前就对“反右”、批“白专道路”有不同见解。在1966年1月的日记中，他写道：“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同年2月的日记中，他批判陈伯达神化毛泽东的言论。5月的日记中，反对“把真理当成宗教”，认为“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文革”伊始，他就作出了坚决的批判：“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所谓北大7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他在《血统论》一文中也提出了“只能从实践中检验”人的观点（与70年代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口号十分相似）。而他由批判“血统论”进而指出：“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的牺牲”，也开了80年代“反封建”的新启蒙运动的先河。被捕入狱后，他铁骨铮铮，在材料中写道：“我过去认为，59年到63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样困难。”他的上述见解都已被历史所确认。1970年，他被虐杀。他以独立的思考显示了思想者的独立人格——正是这种独立人格使他的思想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殉道者。

还有朱守中。他也在“文革”中就看准了“文革”的要害：“这次文化大革命，说穿了，是党内少数野心家、坏家伙，为了争做老大老二，称王称霸、独吞胜利果实，大搞其清一色，不惜采取排斥异己，出卖同志，杀戮功臣、篡军篡政，焚书坑儒等卑劣手段而制造的一场大阴谋、大悲剧。”他还敢于为刘少奇鸣不平，为彭德怀、马寅初翻案，质疑人民公社化问题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显示了历史的远见。他也在1970年被虐杀。李邦禹、冯剑华的报告文学《要为真理而斗争》记录下他的思想与事迹。

李九莲则是另一种典型：“文革”伊始，她也是造反派头头。但武斗的血泊使她恐惧。政局的动荡使她猛醒：“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被男友出卖后被捕。在狱中仍抗争，并在“文革”结束前夜的1976年5月写下《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一文。她被虐杀于“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堪称奇冤！胡平在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中记录下李九莲冤案始末，令人震惊。

牟其中亦然。他也走过一条从狂热到猛醒的道路。面对纷乱的现实，他和朋友们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会”，通过研读马列原著照出“文革”的性质：“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一群御用文人，用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欺骗中国人民。”1974年，他写下《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论证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体系的重要性。——他幸存了下来，并在新时期成长为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吕明方：《苦难的力量：他从四川中部走来》）

此外，还有张志新（张书绅《正气歌》）、李郑生（祖慰、节流：《线》）、陈寿图、吴晓飞、丁祖晓、史云峰、邓思京、贾正玉、王笃良、李富元、马绵征、李新夏、孙伯英、杜长绪、安文忠、张坤豪、曾庆华等烈士和大难不死的郭维彬（他们的思想与事迹，均载入群众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划破夜幕的陨星》一书）……还有“文革”中冒死上书毛泽东，反对“文革”的萧瑞怡、王容芬、姜明亮、闻福众、吴小林、胡清亮、王若水、李一哲、李天德、朱锦多、李洪则、叶忠源、黄维鸣、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卢炎……（他们的上书，已由余习广编成《位卑未敢忘忧国》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行世。）

他们忧国忧民，仗义直言，虽然人微言轻，不能改变政治家的意志和历史的进程。甚至因为直言而坐牢、牺牲，但他们却以独立的思想在“文革”的精神荒原中写下了思想史上光辉的一章。他们的思想再次证明了理性不曾泯灭、良知不可能被窒息的古老真理。他们对“文革”的批判、对时代的沉思、对出路的探询，许多都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奏响的思想主题、时代强音惊人地相似、由此可见思想的伟力、思想者的洞察力与预见力。

平民思想者的事迹发人深思：攀登思想的险峰、穿越精神的“禁区”，并非难事。只要心怀良知、忠实于理性、忠实于真诚的生命体验，忠实于独立人格，不唯上，不从众，就不难超越乱世，发现真理。古往今来，一代代平民思想家都从这条路上走来。

只是：为什么先驱者的真诚换来的却常常是屈辱和牺牲？在民主与法制不断走向完善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应再有思想者殉道的惨剧。

#### ◇ “文革”：“红卫兵”的苦难历程

“红卫兵”是“文革”的急先锋，是“破四旧”、“炮打司令部”的主力。但是，在“文革”权力再分配的关头，他们被抛弃了。他们从狂热到幻灭的过程非常短暂，非常富于戏剧性和荒谬感。从“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的骄子到揪“5·16分子”中的罪人再到上山下乡的流浪者——红卫兵的兴与衰都令人难忘。

陈凯歌在《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分析了老“红卫兵”的精神特质：“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这种精神特质的形成显然与当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熏陶有关。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又何尝不是受害者？

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分析了“红卫兵”造反的复杂动力源：“仅用革命导师的号召和发动，一代青少年的理想主义和现代迷信，来解释这一运动，是浅薄的、不完全的。”“红卫兵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诸种矛盾激化的产物。”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后代借造反以宣泄积怨与压抑感；平民“对当时党和国家的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和少数人的‘特权’深恶、痛绝”；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狂热性……汇集到了一起，掀起怒潮——也许，还可以找到心理学上的解释：青春期的躁动情绪与“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自大情绪……等等。

“红卫兵”以“十二月党人”自诩、（5）学习青年毛泽东的榜样，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他们高唱着一首首“语录歌”，“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世界是你们的……寄托在你们身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冲锋陷阵，“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仅打倒了刘、邓、陶，还将斗争的锋芒指向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中央文革”，有的甚至怀疑周恩来……

“红卫兵”的冲击力、破坏力都十分惊人。但，来得快，去得也快。

有的，是因为自己的父母受到“文革”的冲击而走上反对“文革”之路，并因此受到了无情的镇压（秦晓鹰：《红卫兵之旗》）；有的，是因为“大串联”中接触到贫困落后的现实而压抑（冯骥才《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有的，是因为夺权斗争中两派内讧、排座次时失势而强烈不满（安文江：《我不忏悔》）；有的，则因为不满于揪“5·16分子”、工宣队管理学校而愤世、沮丧（胡平、张胜友：《历史沉思录》）；还有的，则因武斗的恐怖而猛回头（如李九莲）……更多的人是因为“林彪事件”而觉悟，走上思想之路的……

当年复旦大学的“红三司”司令安文江在回忆录中写道：“始乱之、终弃之、大学红卫兵是可悲的；但这种被弃使我们没有在极左道路上滑得更深更远，其中一部份开始自省，这又是红卫兵的大幸。”“这是‘自我回归’的开始。从1966年6月造反，到1967年1月被弃，不过7个月光阴，他们走完了精神巨变的历程。“狂热——迷茫——震惊——压抑——自省——清醒——抗争……是大多数红卫兵的共同心迹。”（6）一部份成了阶下囚。一部份组织起“地下文艺沙龙”，传阅“内部读物”，写作“地下文学”，也悄悄探讨“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还有中国未来的命运如何的问题”（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部份厌倦于风云变幻，偷渡国境，献身“世界革命”的伟业，直至长眠异国（秦晓鹰《偷越国境的红卫兵》）。大部份上山下乡，沉入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

“红卫兵”由“造反有理”到“兔死狗烹”的历程，充满强烈的荒诞意味。在“造反”、“打倒一切”的狂潮中，他们是理想主义少年也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打手；在挨整、被放逐的历程中，他们中的不少人走上了“看破红尘”或“玩世不恭”的人生之路——“许多人开始变得沮丧、愤怒、痛苦、困惑、焦虑……抱着玩世不恭和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抽烟、喝酒，以此来对抗现实，而这在文化大革命前被他们斥之为‘堕落’”。有人回忆说：“我们有点发疯，简直全变了。我们常常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唉！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想找个借口发泄一下，但又发泄不出。我们感到自己失去了一切：以往的那些希望和热情。这些东西空幻而不真实。……我觉得自己恨所有的人……一切都失去了意义”（7）——这段“红卫兵”的自白与西方“垮掉的一代”的情绪何其神似！与世纪末文坛上现代主义思潮多么相通！由此可见：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革命热情与冷漠心态、自命不凡与玩世不恭、革命战士与颓唐青年之间，并没有一条鸿沟。从这层意义上可以看出：“文革”也为世纪末现代主义情绪的滋生，疯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这，恐怕也是发动者与参与者都万万不曾料到的吧！

从“解放全人类”的狂热到“信仰危机”的迷惘，只一步之遥。“平民思想者”以殉道的血开辟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道路。颓唐的“红卫兵”则以玩世的活法为“世纪末情绪”的流行创造了条件。

而那些在武斗中死难的灵魂，又今在何方？

“红卫兵”的崛起与衰亡，前后不过一、二年光阴。可“红卫兵情绪”已死死地缠住了当过“红卫兵”的一代人。时光冲刷不掉他们的“文革”记忆。当他们中不少人写下了凭吊往事的回忆时，他们中也有人从“红卫兵情绪”中提炼出“重建人文精神”的元素，从而显示了“红卫兵情绪”的某种现实意义——当今猛烈批判人欲横流现实的斗士张承志、梁晓声都曾是当年的“红卫兵”。

历史的风云，就这样变幻难测。“红卫兵”留下的历史教训与精神遗产，还会在当代史上持续发挥难以预测的作用。

## ◇ “文革”：普通人的回忆与思考

从前的历史，只记载了英雄和贵族的业绩。20世纪，随着民主化进程的胜利，新的历史观已深入人心：“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因为“每个普通人如果不回忆过去的事件，就不能做他需要或想要去做的事情”；〔8〕因为“我们所说的‘历史’和我们个人的‘记忆’，初看起来好像有所不同，实际上它们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头脑里所记的许多东西，并不纯粹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它还包括许多听来的东西或从书本上得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9〕这样的历史更具平民意味、生活气息，

更能开启“认识你自己”的智慧之门，也更能昭示社会生活与历史进程的丰富与玄妙。我对普通人的“文革”回忆录，有格外的兴趣。

冯骥才的口述实录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因此而十分可贵。那么多经历过“文革”的普通人“急渴渴设法找到”作家、倾诉人生的秘密，便是奇观；而他们那些千奇百怪的经历也给了作家以人生的启迪：“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法也会相形见绌……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见该书“前记”）《拾纸救夫》的启示是：“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崇拜的代价》的启迪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我到底有没有罪？》问苍天：我到底是害了我爹还是救了我爹？”《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讲述了“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化过了”的人间悲剧（堪称一代人未老先衰的证明）、《当代于连》是《红与黑》的逼真重现；《笑的故事》荒唐无比也真实无比；《我不是右派，是左派》告诉人们：“不正之风可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应该全国到处设绞架，凡是祸国殃民、给党抹黑的、就除了他”的气话昭示了民间的不满，也传达出“文革”的影响犹存的信息；《我变了一个人》的教训是：“直到现在，我还是怕遇到好事，不怕坏事”；《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的教训是“谁听了话谁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挺好”；《复仇主义者》的愤愤不平在于“我倒霉倒成这个样，可整我的那些人个个好好的”。《说不清楚》记录了“吃哑巴亏，上糊涂当，等着挨折腾”的悲剧性格，进而思考：“是性格悲剧、还是悲剧挑选的这种性格？”《“文革”进行了两千年》发现了“历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圈”，见解独到；《六十三号的两女人》的悲叹是：“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没有情节的人》以内心的精明塑造表面的装傻卖呆，幸运逃过劫难，可到头来又发现了“没有自己”的无比悲哀，发现了“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这又是为什么？”《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为的是不甘于失去活下去的心劲；《忏悔录》的诘问是：“人为什么不能重活一次？”“残酷的人生与社会教给我的是：永远再不要单纯、永远再不要做违心的事。”……可谓：篇篇是血泪写成，字字浸透难言的忧愤。十年“文革”，伤透了亿万普通人的心。“文革”后广为流行的“信仰危机”、浮躁心态、冷漠情绪、社会风气不正……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文革”的后遗症。由此可见，普通百姓的心灵一旦受到政治运动的伤害，是多么难得痊愈！政治捉弄了百姓，百姓便疏远了政治。《一百个人的十年》充份证明：普通人的“文革情绪”根深蒂固。不同的人从“文革”中汲取了千差万别的人生教训，并据此而给自己的后半生定位。原来，“文革”还活在当代人的生活中。

诗人杨牧的回忆录《天狼星下》记述了当年随盲流大军“走西口”、去新疆躲避迫害、在荒原中求生、在动乱中坚持的苦难历程，富于传奇色彩。政治的动乱与生计的磨难，使诗人阅历了广阔的人生，感悟了复杂的哲理。书中有许多真实的人生故事、人性分析，有“文革”作为悲剧与作为闹剧的真实景观；有对自己“既想革命又怕革命本来就怕别人革还想以己革去御他革且自悲自傲而无论谁革或无论革谁又都缺乏革命激情”的彷徨心态的自审（是研究“文革”心态的生动范例）；也有“乱世造平庸，凡夫生苟安”的人生风景（逍遥，苟安，也是一种消极抗议，又是道家精神的悄悄复归）；还有对世风变迁的真实记录（“不知因何进入这70年代以后，羞耻感已不复存在”）……一部《天狼星下》，是顽强生命意志与苟全性命心态的真切记载，



是当代人在狂热与冷漠间徘徊的典型缩影，也是当代“盲流文化”的一份研究报告。

诗人流沙河的回忆录《锯齿啮痕录》讲述他在历次磨难中的人生体验：挨斗时“宜打败仗，切忌辩驳”，反能收到化严肃为轻松的奇效；（多少志士铁骨铮铮，只有牺牲！）挨斗时“脸上做出一副温驯无害且能‘正确对待’的表情，心中却在诅咒‘小法西斯’”也是一种斗争艺术，这还得感谢“左家庄”的“十年教训”；政治运动热火朝天时，就装老实；稍一松动，就写作，就听“敌台”自得其乐；——这一切，也全赖百姓的影响，与人民群众结合的收获；故乡百姓“合斗争与娱乐为一”，视运动与看戏无二；“从来不认为挨骂啦下跪啦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把挨一顿骂说成是‘吃一碗宽面’，所以把下一回跪说成是‘下一趟贵州’，都纳入了饮食和旅游的范畴”。民间文化，具有多么强大的解毒力，足以化苦难为幽默，说它是“麻木”也罢，斥之为“阿Q精神”也罢，它却实实在在是民间百姓的一艘避难方舟。《锯齿啮痕录》从苦难中发现了诙谐，从悲剧中发现了喜剧，别具辛辣的“川味”。

经济学家于光远的回忆录《“文革”中的我》则写得极平淡、极散漫，因此也显示出另一种情怀：豁达、冲淡，还有轻蔑。书中有自审，也有自慰；天性乐观，家庭温暖，是喧嚣中的乐园；潜心读书，还编出一份《马列论喝酒》的奇特资料；观察生活，发现“走单帮”的人们根本不理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结论不能不认为自发的经济势力更强”；因为王洪文当上副主席而“彻底抛弃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一场政治运动因为地震就一下子停顿下来了”的奇观：……字里行间，都透出作者的“革命的阿Q主义”；“顺境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逆境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经常乐乎乎，是我喜欢的性格”，又称“喜‘善’哲学”——堪称“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的标本。

影星刘晓庆的回忆录《我在毛泽东时代》真诚回忆了如烟的往事：“毛主席，他拥有我全部的初恋！”在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对毛泽东的爱与要求入党费尽她全部的热情与心机。而两大主题的落空也极富象征意味，导演陈凯歌的回忆录《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真诚反思了自己的过失：“在‘文革’中，我吃过苦；我看别人受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苦——我是群氓中一分子。”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将个人的体验与历史的大事件糅在一起再加入理性的反思——这篇回忆录因此而格外深沉、凝重。

看来，“文革”回忆录注定要成为个性的证明，为当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分析的丰富素材。

此外，还有大量的“知青回忆录”，还有那些回忆“文革”的随笔（如林斤澜的《“红八月”》系列随笔，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萧乾的《“文革”杂忆》），还有广为流传的那些“文革”笑话（这方面的代表是《雨花》杂志开辟的《新“世说”》专栏中刊发的笔记体随笔）……都值得玩味，值得深思。“文革”是一场大悲剧，也是一场大喜剧、大闹剧；“文革”是人性恶的大暴露，也是人生荒诞的大展示；“文革”是一场大宣泄，大幻灭，又是一场大游戏、大演戏——一切的回忆都可以作证。

作为“人民”（这似乎被认为是一个太空洞、太抽象的名词）主体的广大平民百姓，他们在“文革”中的遭遇与野心家的为非作歹形成了何其强烈的对比！“文革”改变了许多百姓的人生道路、人生信念。这方面的教训，十分深长：单纯的人为什么注定受骗，又是如何被骗的？机灵的人怎样识破骗局，又是怎样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有多少人自始至终扮演着“局外人”、“逍遥派”的角色？又有多少人由普通人经过思想与奋斗成长为社会精英？……一切的一切，都有待更深入的回忆与思考。

◇ 结语：“文革”记忆还需要什么？

“文革”难以忘怀。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与纪实文字，已经建成了一座无形的“文革”博物馆。然而，“文革”的一切还远远没有暴露于天日之下。

我们还缺少史诗巨著，缺少全景画式描绘“文革”风云、描绘“文革”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实之作；缺少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组织“文革”全过程的纪实之作；缺少记述那些风云人物、匆匆过客详细心路历程的纪实之作……如果不及时去抢救史料，历史上又会留下多少不应有的空白！

我们更缺乏《“文革”文化史》、《“文革”政治史》、《“文革”通史》……这样的史学著作。

1986年，巴金老人大声发问：“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10）

即使现代化进程已大大削弱了“文革”重演的社会基础，当代人也应出于历史的责任感填补那些空白——至少，为了不在当代史上留下太多的迷雾、疑点，为了牢牢记住那十年浩劫，那改变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人生观与命运的无比惨痛又无比荒唐的十年悲剧。

我们应该记住“文革”，一如我们应该永远记住鸦片战争、抗日战争一样。

我想以重述冯骥才先生《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关于“文革”博物馆》里的一段话结束本文——“一代人经受的惨痛教训，是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是努力建造起一座把这教训变为财富的‘文革’博物馆。它将把‘文革’用实物以历史见证人的方式展示给世人。在这里，一代代中国人将亲眼目睹、身临其境他们的父辈祖辈经历过的一切，从而深信不疑。这赤诚又愚昧的时代画面，真实又荒谬的‘文革’文化，将把一个个关于社会弊端、文化劣根和自身弱点的问题摆出来，迫使他们做出思考和解答、并唤起他们文明生存所必需的良知、义务和人格力量。这样，他们才能不再像父辈祖辈那样因盲目而盲从，因无知而无畏，因愚昧而重蹈灾难的覆辙……”

注释：

（1）（10）《“文革”博物馆》，《新民晚报》1986年8月26日。

（2）《哈佛大学新开基础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参考消息》1988年9月15日。

（3）《“文革”第一年》，《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4）石言语，见《作家、评论家、编辑家推荐1988年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集》第28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5）马利《老红卫兵风云梦呓录》，《中外文学》1989年第二期。

（6）《我不忏悔》，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第5辑，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7）阿妮达·陈：《毛主席的孩子们》第189—190页，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年版。（8）卡尔·贝克：《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第258、2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第16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 原载《文艺评论》（哈尔滨）1996/01

~~~~~

【痛定思痛】

## 《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

• 冯骥才 •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份，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复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财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受到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内心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阵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忏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露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只有后人才能完成。因此本书不奢望给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法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颗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着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耐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启示未来。

□ 写于1986年

~~~~~

## 【前事不忘】

### 关于“文革”博物馆

• 冯骥才 •

十二年前，当举国沉浸在文革覆灭的极乐里，一个老人独自在整个民族被损害的心灵残骸上低首徘徊。他不断以一篇篇沉重的忏悔录，催动人们灵魂的自我修复。几年过去，社会改弦更张，现代生活的声光化电充满魅力地倾盖中国；贫困已久的中国人急于富裕起来，这桩未被深究、尚无答案的历史上最惨重的文革悲剧却被不知不觉淡却了。这老人忽然仰起头来，庄严地呼吁：

“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

他便是巴金先生。

听到这声音，我突然想起文革初我家被洗劫一空的那个晚上，我躺在黑糊糊的走廊地板上睡着，外边人们正在相互残害，不知为什么，梦里忽然响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被这号召仁爱的神圣的音响惊醒，满脸以及脸旁的地板上全是泪水。

我从巴金先生的呼吁里，再次感受到一如《第九交响曲》这种对人类博大圣洁的爱心。在作家心中，比恨更大的是爱，比过去更重要的是未来。然而他比我们年轻一代更年轻地看到，中国要想真正的进步，必须永远不丢掉文革这个历史怪物和政治怪物，正视它、反省它、唾弃它。

尽管文革被政治处死，它的幽灵犹存未泯。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未被铲除，谁也无法保证文革永不再来。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消亡，但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旧顽强地活着；文革的影响有多久，它再生的危险就有多久，历史的重复决不会采用同一形式。监视它以任何形式的再现，只能依靠从中觉醒的人民。在历史前进的进程中，觉醒和成熟的人民与之同步。

然而，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写信给我，说他看过《一百个人的十年》后不相信是真的，他认为生活不可能发生这些事，纯属我的胡编乱造。他父亲看了，却告诉他：“文革就是这样，甚至更残酷、更荒唐。”他信服了。我却不敢置信，这场全民族的悲剧结束不过十年，有些情景还在恶梦里常常出现，怎么会成为年轻一代异国他乡的奇闻？这样会带来什么后果？

一代人经受的惨痛教训，是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

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是努力建造起一座把这教训变为财富的文革博物馆。它将把文革用实物以历史见证人的方式展示给世人。在这里，一代代中国人将亲眼目睹、身临其境他们的父辈祖辈经历过的一切，从而深信不疑。这赤诚又愚昧的时代画面，真实又荒谬的文革文化，将把一个个关于社会弊端、文化劣根和自身弱点的问题摆出来，迫使他们做出思考和解答，并唤起他们文明生存所必需的良知、义务和人格力量。这样，他们才能不再像父辈祖辈那样因盲目而盲从，因无知而无畏，因愚昧而重蹈灾难的覆辙，以清明透彻的科学头脑投入强我中华的现代化事业中去。只有把文革真正送进博物馆，变成一块文化化石，才能说我们永远告别了那个时代。

出于同一想法，我为一批普通的文革经历者立档。我对文革的所谓高层“内幕”从无兴趣，我关心的只是普通百姓的心灵历程。因为只有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真正经历。从文学的本质上说，作家提供的只能是人物，所以我的纪实，主要是人物的心理纪实。我把这部书的写作做为文革博物馆的工作之一，尽管它艰巨浩繁，但每到深夜孤灯、劳顿不堪之际，想到这每篇纪实都将送往迟早实现的文革博物馆，顿觉激情陡增，伏案奋笔。我想，文革博物馆一旦落成实现，将是我们民族一座伟大的博物馆，它将把恨化为爱，把荒谬变为智慧，把一代人十年的不幸变为后世永恒的幸福。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mailto: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 (WWW) 地址: <http://www.cnd.org/>

---